

文学哈哈镜中的世界：

《野猫精》中的伦理选择与叙事范式

**The World in the Distorting Mirror of Literature:
Ethical Selection and Narrative Paradigm in *The Slynx***

姜磊 (Jiang Lei)

内容摘要：塔·托尔斯泰娅的成名长篇小说《野猫精》是一部充满伦理冲突的作品。小说呈现了“大爆炸”引发的“人”从肉体到精神的“返祖”现象和“人兽混融”的社会生活图景。“人”不再为人，而以“亲爱的”互称，他们再次面临从自然选择向伦理选择的过渡。这一过渡过程中充斥着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伦理对撞。小说中，主人公犯下大罪后伦理意识复苏，并被寄予复兴文化的重任，这种“浪子回头”的书写范式承袭和延续了俄罗斯文学的伦理教诲功能。

关键词：《野猫精》；伦理选择；塔·托尔斯泰娅；叙事范式

作者简介：姜磊，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俄罗斯文学。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俄罗斯文学高加索文本研究”【项目批号：19YJC752012】和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索引(CFLSI)的研制与运用”【项目批号：18ZDA284】阶段性成果，并受“浙江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资助。

Title: The World in the Distorting Mirror of Literature: Ethical Selection and Narrative Paradigm in *The Slynx*

Abstract: Tolstoy's famous novel *The Slynx* is a work full of ethical conflicts. The novel presented the "atavistic deformity" phenomenon from body to spirit caused by the "Blast" and the social picture of confusion of ethical identity and broken ethical taboo. People no longer claimed to be human, but as "darling", once again, they faced the evolution from natural selection to ethical selection. This transition process was full of ethical conflicts between human factors and animal factors. In the novel, the hero's ethical consciousness recovered after committing a great crime, he was entrusted with an important post of reviving culture. The writing paradigm of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in the novel inherited and continued the ethical teaching func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Slynx*; ethical selection; Tatyana Tolstaya; narrative paradigm

Author: Jiang Lei, Ph. D.,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 specializes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Email: jianglei019@163.com).

达吉雅娜·托尔斯泰娅（Татьяна Толстая）的长篇小说《野猫精》（Кысь）从一问世就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激烈争论，一时间成了风头无两的畅销书。该作品描述了在遥远的未来，莫斯科发生了“大爆炸”，人和动物体态、社会形态、思想价值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异变。“爆炸”200年后的库兹米奇斯克（也即莫斯科之现名）呈现出完全独特的社会生活图景。《野猫精》最直观的异样之处在于，其体裁类似“童话体小说”，是“一个复杂的体裁合成体，其包含了寓言、童话、讽刺抨击元素、乌托邦传说等元素”（Пономарева 162）¹。作家在长篇小说的空间中塑造了奇异、野性的童话世界（диковинный и дикий мир），将科幻、民间文学等元素与长篇小说叙事和谐相融于一体。作品中“未来的石器时代奇幻世界”与孕育作品的后苏联初期社会景观构成映射。作品不但彰显出“反乌托邦的神话诗学世界图景”（Антиутопическая мифопоэтическ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Крыжановская 1），又蕴含着对处于改革洪流中的现实文化生态的隐喻。因此，利波维茨基（Липовецкий）、伊万诺娃（Иванова）、拉特宁娜（Латынина）、卡巴诺娃（Кабанова）、谢春燕、陈训明等国内外研究者大多将《野猫精》视为一部反乌托邦作品，认为作品充斥着强烈的讽刺意蕴，有学者甚至将其认定为思想意识小说（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Беневоленская 132）。目前，学界针对该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文本呈现出的骇人末世图景，也即反乌托邦表现；2、文本的后现代叙事策略，荒诞性的情节架构和异质性的语言特征；3、人物形象研究：主要是文中的各类知识分子式人物对比研究，女性形象的异变研究。

对于一部酝酿构思、创作时间（1986年-2000年）涵盖了俄罗斯社会剧变时期的作品，其不仅蕴含了社会生活图景演变，国家形象异变等社会现实意义，更传承了俄罗斯文学深厚的教诲范式，呈现另类的“俄罗斯生活百科全书”（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Лейдерман, Липовецкий 472）。《野猫精》是一部充满伦理冲突的作品，呈现了“人”再次从自然选择向伦理选择过渡的历程。也即人的生成和成长，生而为人意义是作品的核心题旨，而“浪子回头”的伦理书写是小说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承袭。

本文从伦理选择和作品叙事范式入手，解析了作品中科学选择之负面作用引发的人这一种群从肉体到精神的“返祖”，人不再自称为人，而是以“亲爱的”（голубчик）互称，“亲爱的”们要再次面临从自然选择向伦理选择的进化；文章剖析了这一过程充斥着激烈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伦理对撞，

1 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进而阐明作品旨在以一种新的形式来承袭和延续俄罗斯文学的教诲功能。

一、伦理选择和未来史前社会：“另类”文明构建模式

在《野猫精》中，“亲爱的”们将再次面临从自然选择向伦理选择跨越的挑战。也即从“未来的原始人”再次进化为真正的人。“自然选择的意义在于人与动物初步分离，人获得了生而为人的人的外在形态，从而使人能够从形式上同兽区别开来”（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3）。伦理选择使人显现出与兽类相区别的人之本质属性，即人拥有了伦理意识，善恶观念得以成型。“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就是自然选择与伦理选择不断重复的历史”（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3）。人类的文明绝非简单的线性发展形态，而是缓慢的螺旋式递进，在某些细部可能存在不断复现，甚至是暂时后撤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文明至今仍然时刻面临着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而从科学选择回到自然选择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或者说，自然选择——伦理选择——科学选择之间的内在微循环模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客观存在。同时，科学技术作为一个具有颠覆性影响的因素嵌入人的生活之中，可能会挑战、冲击人和人类社会的自然周期性。科学技术的介入可能会使传统的人之概念发生异变，甚至可能被击碎和被颠覆。克隆人、变异人的出现使人成了一种非纯粹的物种，不仅在外形上挑战了传统的人之定义，更是催生了一系列十分复杂的伦理问题和身份认同矛盾。《野猫精》中“亲爱的”们之所以生活在“未来的石器时代”，是由于人错误地驾驭了技术这柄利剑，从而使人类社会被迫回到过去。作品中“人”从自然选择到伦理选择的二次历程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某种合法性和必然性。

作品叙述的历史全面倒退和人之生物特征的异变是这种二次选择历程的前提。小说伊始，主人公贝内迪克特从母亲口中得知，由于“人们游戏时玩弄武器”（托尔斯泰娅 12）¹，发生了可怖的“大爆炸”。这种大爆炸的后果是人这一种群发生了分化和裂变。其中，一部分人由于心地善良而在“大爆炸”之后得以容颜永驻、长生不老，成了所谓的“畴昔的人”（прежние）。他们不仅外表健全，而且保留了完整的文明社会的记忆，是传统文化的最后守望者。另一些人虽然长着人的面孔，身上却长满了毛，且四脚着地，失去了直立行走的能力，他们保有部分往昔的记忆，在现实中又不得不做最繁重的活，成了牲口的替代物。“大爆炸”之后出生的“人”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异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后遗症。他们形态各异、千奇百怪。有的皮肤发生了病变，手上像是涂了一层绿色的粉末；有的长着鱼鳃之；有的长着鸡冠或是鹿角；有的胡子从身体的隐秘部位长出，且一直长到膝盖边；有的鼻子从膝盖上钻出来。

1 本文中相关作品引文均出自 托尔斯泰娅：《野猫精》，陈训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下文仅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主人公贝内迪克特“没有显现出什么特别的后遗症，面庞干干净净，现出健康的绯红色，身体结实，手指数目正常，没有长蹼，也没有长鳞甲，鼻子只有一个，眼睛是两只”（28），但是他却长了一条尾巴，且自认为是“寻常的，长在后面的尾巴”（133）。对于人类而言，尾巴是一个特殊的器官，在生命初级阶段，也即在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体的祖先，原始脊椎动物身上长着肉质尾巴。科学研究表明，尾巴的消失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人类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是人与动物之间最显性的区别，是人剥离兽性向更高层次进化的直观表现。直到现在，在人的胚胎组织上依然能够清晰地观察到尾巴，而人在自然发育过程中，也即本能的自然选择过程中，抑制了尾巴的进一步生长，保留了潜藏于身体中退化的尾巴（尾骨）。然而，“大爆炸”诱发的“亲爱的”们身体上的异变，尤其是贝内迪克特所长出多余的尾巴说明了“大爆炸”后人这一物种在生物学上的形态发生了显性的改变。《野猫精》中的人物出现了返祖现象。

伴随人之生物特征异变而来的是其精神范畴的退化。“大爆炸”之后出生的个体不再是确定无疑的人，而互称“亲爱的”，他们集动物特征与人之特征于一身，嬗变为介于人和动物之间的“人兽”一般的存在。这种兽性不仅在身体形态上有显性表现，在精神层面同样清晰可见，即体现为精神和内心和谐的丧失（духовность и внутренняя гармония）。语言发生了突变，“畴昔的人”、“亲爱的”、“蜕化变异者”相互之间难以正常交流；“亲爱的”们都失去了亘古相传的生活常识；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成了行尸走肉。“亲爱的”们的称呼是其人兽混融性特点的体现之一，他们的姓名都是类似 Иван Говядин（Говядина 是牛肉的意思，其姓名为伊万·牛肉），Марфушка（марфа 是吸毒的意思，其名为吸毒者），Шакал Демьяныч（шакал 意为胡狼，其名为胡狼·杰米杨内奇），Верка Кривая（кривой 原意为哈哈镜，也指瞎了一只眼的人，其名为瞎眼的维尔卡），Клоп Ефимыч（клоп 意为臭虫，其名为臭虫·叶菲梅奇）等人兽组合。

由于社会主体“人”发生了外在和内在的退化，《野猫精》中的社会形态也退变为一种混溶性的“人兽社会”。社会由大穆尔扎、小穆尔扎、亲爱的、畴昔的人、蜕化变质者共同构成，社会个体依然履行着工作、学习的义务，体验恋爱、结婚、生子的人生历程，享受美食、娱乐、休闲，但是他们的美食是受到辐射严重污染的老鼠、铁锈、蛆、月光果、基因突变的兔子和鸡蛋；他们的娱乐是自残，以至于节日过后，城里就会出现大量的残废和莫名消失的无用躯体。“大爆炸”之后，莫斯科几度易名，莫斯科——南方仓库——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斯克——伊凡·波尔费里奇斯克——费多尔·库兹米奇斯克——库德亚尔·库德亚尔斯克，然而都以统治者的名字来命名，映射出其强人政治文化传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评论者认为，《野猫精》映射了俄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也即“俄罗斯历史在文学中得到了证明”

(Крыжановская 7)。

“《野猫精》中的世界是阴沉可怖的，极其残酷的，也是混沌模糊的，人们没有过去，没有现在，甚至未来对他们而言也是不真实的。注定的灭亡，毫无出路的结局笼罩着库兹米奇斯克城的居民”（Пронина 31）。在小说的艺术世界中，人与动物的界限变得异常模糊，对包括主人公贝内迪克特在内的“亲爱的们”而言，他们“更加关注生存的物质方面，与饱腹相关的（话题）最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而与之讨论道德、精神、文化等话题是徒劳的，因为这些范畴已经在他们的理解之外了”（Беневоленская 134），因而出现了社会形态异变、群体伦理身份模糊、家国矛盾激化等一系列伦理混乱问题。

二、混乱图景：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伦理对撞

《野猫精》中生活在人兽混溶社会中的“人”之退化必然导致人性的部分丧失和兽性的疯狂滋长。“从伦理意义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斯芬克斯因子是文学作品伦理表述的核心内容”（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1）。《野猫精》中“大爆炸”之后的人不仅在外形上发生了明显的异变，这种异变同样在其精神世界方面得以清晰表现，也即斯芬克斯因子的动态组合发生了变化。“亲爱的”们身上彰显的是一种特殊的斯芬克斯因子组合和变化过程。首先，主人公贝内迪克特不仅在外形上多出了代表兽性的尾巴，而且部分地丧失了理性意志，他和其它“亲爱的”一样，将老鼠视为不可多得的珍馐美味，从小就会捕捉蛆用以制作老鼠汤。在那个“石器时代”，他从事抄书工作，是一个颇为体面的“知识分子型”人物，但是却不知道马为何物，将老鼠称作马，深谙铁锈的使用之道，把铁锈当烟抽，当墨水写字，当染料染花线，用铁锈泡茶，用它制家酿啤酒，堵塞房子的缝隙。他是书迷，却不知道普希金是谁。“书籍是精神食粮”的言说在他看来，是因为读起书的时候，“肚子里咕噜地叫的声音就不那么厉害了”（79），更重要的原因是“把读得书卷成烟来抽的时候”（79），感觉尤佳。“畴昔的人”尼基塔认为，即使贝内迪克特已经学会了所有字母（азбука），熟记了字母表，甚至抄了一千本书，他仍然还不会读书，“书籍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一些无谓的簌簌声，是一堆干巴巴的字母，而极其重要、生而为人生活基本常识（жизненная азбука）还远远没有掌握”（267）。

贝内迪克特的妈妈向他讲述，“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只是目前还未见成效”（78）。关切、同情、慷慨、真诚、正直、灵敏、自由、互相帮助、尊重他人、牺牲自我等沁润伦理意识的概念对他来说难以理解，且毫无意义。贝内迪克特在追求女性时，依然保留着最原始的性冲动，也即一种体现自然意志的兽性本能，他走到女孩跟前，“当即倒在地上，翻来滚去，做出各种求爱的姿势”（101）。在自然界中，雄性动物寻求交配时往往会展示自己的“能力”。

这种求爱仪式凸显出贝内迪克特的动物的繁殖本能，兽性抑制了他身上的人性闪光。

贝特迪克特的亲密朋友，人生导师尼基塔·伊万内奇用斧头帮他砍断了长在身后的尾巴，从而迫使他完成了自然选择，在外形上成了一个完全健全和正常的人。斩断了多余的尾巴，不仅使贝内迪克特部分地褪去了兽性，而且为其身上人性因子的增长提供了基础与前提。尼基塔·伊万内奇对贝内迪克特抱有很大的期望，多次力邀他参与保卫传统文化。他用木桩在“大爆炸”过后的城市中竖立起“尼基塔城门”、“巴尔秋克”、“波良卡”、“受难林荫道”、“库兹涅茨桥”、“沃尔洪卡”、“阿尔巴特”等莫斯科历史文化地理坐标，“为了纪念”和铭记历史，也为了“文化复兴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24）。尼基塔将改造和教育贝内迪克特视为余生最大的责任，对他讲授康德的哲学，让他铭记“普希金是我们的一切：既是星空，也是胸中法则”（161）。最后，亲自督促他雕刻普希金像，共同在“受难街”为普希金建立纪念碑。在尼基塔的谆谆教诲之下，贝内迪克特身上的人性因子不断丰富，而兽性因子持续萎缩，从而使他不仅获得了人之外形，也逐步完善人之内核——伦理意识萌发和高扬。贝内迪克特身上人性因子开始对兽性因子形成有效的管控和约束，他身上的人性在道德教诲中完善。人性因子占据上风的主要显性表现是贝内迪克特开始拥有了分辨善恶的能力。也即在老妈去世的时候，贝内迪克特放声痛哭，悲痛万分。“他不仅仅是可怜自己而泣不成声，他也可怜亲戚朋友”（99）。

虽然贝内迪克特经过了“被迫的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但他身上留有浓重的斯芬克斯遗毒，也即一种难以清除的动物性，或者兽性。这种兽性在其岳父“总卫生员”所构筑的负面伦理化境中被迅猛刺激和快速培育，他对于书本占有的欲望逐渐被点燃，演变成为一种极度的被理性，吞噬刚刚萌芽的人性。因此，他“用钩子把所有这些人勾住，在地上拖，然后将他们统统拴在桌子和凳子上”（243），冰冷又锋利的钩子“直接刺中亲爱的们（朋友们）的脖子，刺中脖子上的血管，血管被勾了出来，流出黑糊糊的东西，脑袋倒向异变，眼睛变得无神”（215）。

贝内迪克特迷恋收集书本，却好读书而不得其意，将收集“古版书”与保卫艺术免遭毁灭等量齐观，而阴谋家岳父利用了他的这一独特想法，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伦理语境。政变成功后，岳父为了排除“政敌”尼基塔的威胁，想要除之而后快。他命令贝内迪克特将尼基塔绑在普希金雕像上，将其焚烧至死，否则就毁坏贝内迪克特收藏的所有珍贵书籍。贝内迪克特已经认同了“普希金是我们的一切”的言说，甚至“爱普希金爱到难以形容的地步”（306），且尼基塔·伊万内奇是“老朋友”，是精神导师。“贝内迪克特摘下帽子，站在民众的前面，威风吹弄着他残留的头发，吹干了他眼中的泪水。两个人他都怜悯，无论是尼基塔·伊万内奇还是普希金”（317）。另一方面，在他

看来，书本即艺术，艺术很珍贵，保全艺术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若想保全艺术，就得告别普希金，两者必居其一”（318）。显然，贝内迪克特陷入了一种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式的伦理困境。站在贝内迪克特的立场上，将尼基塔绑在普希金像上烧死，不仅意味着毁坏了文化与艺术象征的普希金纪念碑，且背弃了与尼基塔之间亦师亦友的亲情和友情；而放任岳父烧毁他所收藏的书籍则意味着摧毁了现存的人类文化之瑰宝，湮灭了人类精神文明复兴的希望。

迎娶了库杰亚尔·库杰亚雷奇的女儿奥莲卡之后，贝内迪克特告别了老鼠、铁锈和肥蛆，与岳父一家过起了所谓的“精神生活”。岳父家常吃用“树精”（древяница）和帕乌林公爵鸟（Княжья Птица-Паулин）做成的“忘川菜”（каклеты）。但是，“树精”是一种长着和人一样的手，一样躯体的存在。“树精”会不时“伸出一只手，一会儿用关节突出的手指插在腰上”。帕乌林公爵鸟更是一个自尊自爱的“美人”。她的“眼睛占了半边脸，而红红的嘴却和人的嘴无异（……）帕乌林鸟不断地转动脑袋，不断地欣赏自己全身，怎么也看不够；还不断地亲吻自己。任何人都不会受到这雪白鸟儿的伤害，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55）。“人如鸟，鸟如人”是人类各民族语言的共性现象。正如鹦鹉指代随声附和者，夜莺指能歌善舞者，雄鹰则是自由自在的英雄男儿。显然，这种言语现象的根源是人类与鸟类在习性和行为上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虽然贝内迪克特将公爵鸟看作自己“永恒的未婚妻”（вечная моя невеста）和“永远难以寻觅到的爱”（неразысканная моя любовь），但是他仍然津津有味地吃起了用“帕乌林公爵鸟剁碎做成的‘忘川菜’”（Иванова 219），枕着她雪白的羽毛做成的枕头入睡。“人吃人”是贝内迪克特所犯下的罪孽，也是他身上斯芬克斯因子向低层次退化的表现，是伦理禁忌被击穿的典型社会景观。

贝内迪克特自始至终十分畏惧野猫精，而野猫精作为作品的核心意象始终没有正面出现，它只存在于“亲爱的”们转述的话语中，出现在二手的语言空间中。或者说，“野猫精是一个语言产物，充盈着人的迷信、道听途说和偏见，它更像是人的不学无术、愚昧不化和盲目无知”（Пронина 31）。野猫精这一童话式臆想的合成形象（собираемый образ сказочных мифических существ）并非真实的存在，而是人之精神蜕化、堕落的表现，是兽性因子完全压制人性因子的低阶斯芬克斯因子。在这个未来史前社会，在伦理身份模糊、伦理禁忌被击穿的混乱语境中，贝内迪克特身上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发生激烈的对撞，直到滑向堕落深渊的边缘。然而，尼基塔对他的教育最终没有使他人性完全泯灭，这为他的精神复活提供了切实的可能。

三、浪子回头：俄罗斯文学伦理叙事的承袭

《野猫精》的销量长期居高不下，足以媲美以大众消费和娱乐休闲为导

向的畅销作品，但所有评论家和研究者无一不视其为真正的严肃文学。可能原因之一是《野猫精》这部孕育于俄罗斯历史巨变时期，看似荒诞不羁的作品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更是俄罗斯文学伦理教诲和道德言说传统在新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续写。

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文学的教诲作用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教诲的实现过程就是文学的审美过程。教诲也是文学审美的结果”（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9）。“俄罗斯文学特别富有教育意义”（高尔基6）。俄罗斯文学始终背负着教诲世人的使命，始终承载者“文以载道”的理想，始终是一种“功利”的文学。高尔基曾指出，“文学使思想充满肉和血，它比哲学或科学更能给予思想以巨大的明确性和巨大的说服力。文学比哲学是更多被人阅读的，而且因其生动性而更能说服人”（1）。在他看来，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是哲学思想最普遍而有效的宣传载体。道德训诫和伦理教诲是俄罗斯文学的显性特征。“俄罗斯文学的魅力，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它们的道德热情和教诲性。如果没有这种充满热情的教诲意识和教诲精神，那么俄罗斯文学根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伟大和令人崇敬”（李建军49）。俄罗斯文学蕴藏着持久而丰富的伦理叙事，包孕着复杂而多元的伦理内涵，经历着灿烂而辉煌的历史演变。在俄罗斯，“美拯救世界”、“苦难拯救世界”、“罗斯——三套马车走向何方？”等一系列重大哲学命题往往借助于文学作品得以提出，加以推广，引发社会大众的思考和讨论。

《野猫精》这部孕育于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看似不无荒诞的作品承袭了俄罗斯文学的伦理教诲传统。简言之，它延续了俄罗斯小说“浪子回头”的书写范式。贝内迪克特是一个“马大哈、糊涂虫，精神上的尼安德特人，意志消沉的克罗马农人，可是，已经看到你身上有人性的火花，寄托某种希望，身上还有一丁点儿智慧”（140）。贝内迪克特作为“畴昔的人”与“变异者”结合的产物，作为“亲爱的们”的一员，由于阅读各种各样的“古版书”脱颖而出，“从书中得知的各种理想世界使贝内迪克特与其他人逐渐疏远起来，想象将其完全裹挟其中”（Шилова 86）。在面临艺术（古版书）和人伦（师友）两者选其一的伦理困境时，贝内迪克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几度犹豫踌躇。这种犹豫和痛苦的心境正是其伦理意识复苏的侧面表现。然而，他最终选择了背叛亲情和友情，选择用烈火烧死导师尼基塔，犯下了滔天罪业。尼基塔·伊万内奇在生命弥留之际口吐圣火，涤清了世间的邪恶。他将被烧毁的残缺不全的普希金像——传统文化之象征和空旷的新生世界留给了贝内迪克特，他最终选择了贝内迪克特作为复兴文化和传统的希望。选择犯有罪业，甚至罪孽的浪子，给予他们精神复活的机会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书写范式。

首先，“浪子回头”的文学书写范式与《圣经》密切相关，俄罗斯民

族的东正教信仰源于基督教文化，因而也继承了《圣经》中的教诲。其次，“浪子回头”也和俄罗斯文化中的弥赛亚思想存在某种关联。在《古史纪年》（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中，俄罗斯民族就自诩血液里流着诺亚的骨血，是闪和雅弗的后裔，是上帝的选民，背负着拯救世界的重任。因此，俄罗斯文学历来充盈着救赎的情节，救赎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罪业，而苦难是救赎得以完成，被救赎者得以通往圣洁的天梯。洛特曼在《19世纪俄罗斯小说的情节空间》（Сюжет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 XIX столетия）一文中指出：在西方文化中最常见的神话情节图谱，也就是一种约定的情节链条：“死亡——地狱——复活”，在众多的俄罗斯文学中，这种情节被暗中替换为另一种情节链条：“犯罪（一种真正的或者是想象的犯罪）——流放西伯利亚——复活”（Лотман 102）。也就是说，《神曲》中但丁式的“死亡——地狱（炼狱）——净化（天堂）”经过俄罗斯文化筛子的“淘洗”就变成了“史诗”作品《死魂灵》中果戈理式的“罪恶（肮脏的一面，泯灭人性的勾当）——流放（西伯利亚）——忏悔（精神净化）”。在《死魂灵》（Мертвые души）第二部残稿中，在听了穆拉佐夫老人的教诲和劝解后，罪行累累的乞乞科夫心里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古怪感觉，良知开始苏醒，人性因子逐渐增强，并就此走上了“回头之路”。当他离开之时，“他已经不是过去的乞乞科夫了。乞乞科夫心里犹如一片废墟。如果把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比作一座拆毁的建筑物，那么可以说，拆除它是为了重新建一座新的大厦”（果戈理 460）。《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身上兼具“圣母玛利亚的理想”和“所多玛城的理想”，是集邪恶与圣洁于一身的特殊存在。德米特里是一个明显体现出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激烈对撞的个体。他虽未真正犯下弑父之有悖人伦的大罪，却背负了这份罪业，渴望通过苦难来洗净自己，清偿所犯下的各种罪恶。《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杀害了借高利贷的老太婆，最终匍匐在“俄罗斯所有罪恶承受者索尼娅的脚下”，并且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手捧福音书虔诚忏悔。对拉斯科尔尼科夫来说，“苦难是他理解人性和忏悔过去的一剂良药”（郑永旺 78）。《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在见到饱经折磨的马斯洛娃之后，为年轻时玷污并抛弃马斯洛娃的行为感到羞愧，最终在与马斯洛娃流放西伯利亚的过程中完成精神上的复活。不仅这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的杰作，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都“不仅具有诗意的抒情性，也有很强的伦理性的感召力和教诲性”（李建军 49）。

结语

《野猫精》塑造了一个奇幻的未来事前社会，呈现了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激烈对撞、伦理禁忌被击穿的“人兽混融”社会图景，而作品所承袭的“浪子回头”叙事范式正是俄罗斯文学教诲功能的集中体现。《野猫精》能够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延续了俄罗斯文学的文脉。俄罗斯文学

从来不是供人消遣的读物，“它向读者提出解决（由作者和读者共同来解决）复杂的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建议（……）文学具有对国家的责任感、教诲、道德和以国家为重的性质（……）”（利哈乔夫 52）。新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受到西方大众文化思潮的影响，一度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趋向。新时期俄罗斯文学表现出多元共存、对话复调、变动不居的宏观态势，形成一种自由化、多元化、过渡化的文化伦理。“文学中心主义”成了一种“过去式”，文学更多地回归本真，乃至出现了如消费品一般大行其道的大众文学。然而，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根基，风格杂糅、主题各异、叙事迥然的新时期俄罗斯文学并未丢弃关注现实，关切国家走向与民族命运，反映社会变革与个体感受的传统。正因此，以《野猫精》为代表的大量新时期经典作品在“后现代外壳下”往往包裹着各种极具现实意义的社会文化论题，它们承载着文学的教化功能，捍卫着文学的伦理价值。简言之，俄罗斯文学深厚现实主义传统照拂下的新时期文学依然对读者颇有启迪与教益。

Work Cited

- Беневоленская Н. П. “«Кысь» Т. Толстой как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А. И. Герцена* 110 (2009): 132-142.
- [Benevolenskaya. “*The Slynx* by Tolstaya as an ideological novel.” *The Journal of Herzen State Pedagogical University of Russia* 110 (2009): 132-142.]
-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
- [Gorky, Maxim.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Trans. Miao Lingzh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79.]
-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四卷），郑海凌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 [Gogol, Nikolai. *The Complete Works by Nikolai Gogol* Vol.4. Trans. Zheng Haili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2.]
- 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а. “И птица изрубить на каклеты.” *Знамя* 3 (2001): 219-21.
- [Ivanova, Natalia. “The birds were chopped up and made into dishes.” *Flag* 3 (2001): 219-21.]
- Крыжановская О. Е. *Антиутопическая мифопоэтическ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в романе Татьяны Толстой «Кысь»*. Томбов: Томб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5.
- [Krzanienskaya. *Dystopian mythological landscape in the novel The Slynx* by Tatyana Tolstaya. Tambov: Tambov State Technical University, 2005.]
- Лейдерман Н. Л., Липовецкий М. Н.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0-1990-е годы. В 2 т.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 2003.
- [Leiderman, Naum and Mark Lipovetsky.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1950s-1990s. In 2 volumes*. Moscow: Academia, 2003.]
- 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下）》，杨晖、王大伟译审。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年。
- [Likhachov, Dmitry. *Meditations about Russia*. Trans. Yang Hui and Wang Dawei. Beijing: Yi Wen

Publishing Military, 2002.]

李建军：“对俄罗斯文学的疏离和误解：论纳博科夫的文学理念与文学批评”，《文艺争鸣》5(2018): 47-57。

[Li Jianjun. “Alien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Russian literature: On Nabokov’s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ture&Art Contending* 5 (2018): 47-57.]

Лотман Ю. М.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В 3 т. Т. 3.* Таллинн: Александра, 1993.

[Lotman, Yuri. *Selected Essays in 3 volumes.* Tallinn: Alexandra, 199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 1-13。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2011): 1-13.]

——：“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4(2014): 8-13。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Fundamental Function and Core Value of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4): 8-13.]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Пронина А. В. “Наследство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О романе Т. Толстой «Кысь».” *Русск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 6 (2002): 31-32.

[Plonina. “Heritage of civilization. About *The Slynx* by Tolstaya.” *Russian Literature* 6 (2002): 31-32.]

Пономарева О. А. “Чужое слово в романе Т. Толстой «Кысь».”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А. И. Герцена* 49 (2008): 160-64.

[Ponomareva. “‘Alien word’ in T. Tolstaya’s novel *The Slynx*.” *The journal of Herzen State Pedagogical University of Russia* 49 (2008): 160-64.]

Шилова Н. Л. *Визионерские мотивы в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ой прозе 1960-1990-х годов (Вен. Ерофеев, А. Битов, Т. Толстая, В. Пелевин).*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Изд-во КГПА, 2011.

[Shilova. *Visionary motifs in postmodern prose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90s (Veins. Erofeev, A. Bitov, T. Tolstaya, V. Pelevin).* Petrozavodsk: Publishing house of Karelian state pedagogical Academy, 2011.]

托尔斯泰娅：《野猫精》，陈训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Tolstaya, Tatyana. *The Slynx*. Trans. Chen Xunm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

郑永旺：“从‘美拯救世界’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美学”，《哲学动态》9(2013): 77-82。

[Zheng Yongwang. “Approach to Dostoevsky’s aesthetics of suff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auty saves the world’.” *Philosophical Trends* 9 (2013): 77-82.]